

# 论清代考据学影响下的陶渊明研究

林华鹏 (厦门大学 中文系, 福建 厦门 361005)

**摘要:** 清代之际, 由于王学学风衰落, 政治极度高压, 考据之风盛行。这对当时的士人治学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在考据学风行的大背景下, 清人对陶渊明的研究带有很强的考据色彩。清代陶渊明研究以考证为基础, 大胆提出问题, 细心地进行论证, 以考据方法来具体欣赏陶渊明诗歌。这些为后人的系统研究提供了详实资料。清人的努力一定程度上恢复了陶渊明的真实景况, 进而以新思路和新方法开拓了陶渊明诗文的文学内涵。

**关键词:** 清代; 考据学; 陶渊明研究

**中图分类号:** I206.09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2-6847(2008)10-143-03

**【作者简介】** 林华鹏(1980-), 男, 福建漳州人, 厦门大学中文系中国古代文学专业 2006 级硕士生, 研究方向: 古代文学魏晋南北朝文学。

由于明清易代, 明代王学末流空疏的学风遭到怀疑, 激发了清初实学思潮; 政治上由于遭到文字狱的迫害, 学者遂寻求其他学术, 又因受到理学思潮的冲击而萌生考证学; 同时, 由于清朝官府修书风气盛行而造就出兴盛考据学的环境。由此, 清代学者强调考据, 主张学习汉代学者以实事求是的态度阐明典籍的古义。他们对浩如烟海的古代文化典籍做了去伪存真、正本清源的工作, 为后人进行文学研究作出了巨大的贡献。

有清一代, 士人对陶渊明的研究带有明显的考据特点。清代的陶渊明研究者在讲究扎实求学、实事求是的考据学影响下, 不再执著于前人的见解和观点。他们在扎实的考证的基础上, 大胆怀疑, 细致论证, 朝着还原历史“真”的陶渊明而不断努力, 从多方面开拓了陶渊明诗文的文学内涵, 促使陶渊明研究朝着更深入的方向发展。具体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 一、致力于陶渊明诗歌相关资料的汇编和考订

在历史的漫长岁月中, 由于众多版本陶渊明作品集的编撰者的水平、标准各不相同, 导致陶渊明作品集大量异文的出现。北宋宋庠在《私记》中说: “余前后所得仅数十家, 卒不知何者为是。”<sup>①</sup> 从这个“仅”字可以看出宋代时期陶渊明版本既多且杂。从宋代到清代的七百多年里, 陶渊明作品在流传过程中由于刻书或者抄书出现的异文是在所难免的。这就使后人在赏析、研究中产生很多的疑惑: 陶渊明形象是真实存在的, 或者仅仅是被历

史篡改想象出来的? 人们对陶渊明和他的作品作出许许多多的见解和评价。为此, 清代士人对陶渊明的作品做了去伪存真、正本清源的工作。由于这时期的独特的治学风气, 清代士人不可避免地运用了考据的方法来研究陶渊明。

清代士人认为有必要保证陶渊明作品的一致性。他们吸取前人教训并参考了已有的成果, 比如宋刻递修本、宋代刻印的(宋)汤汉笺注的《陶靖节诗集》(四卷附录一卷)、元初刊刻的(宋)李公焕《笺注陶渊明集》(十卷本)、明代焦竑本、毛晋绿君亭本等版本的优点。在他们有意识的广采薄收下, 陶渊明作品的整理趋向系统化。通过清人细致、耐心的考证, 他们刊印了三四十种陶渊明诗集。其中比较出名的有吴瞻泰《陶诗汇评》、马璞《陶诗本义》、温汝能《陶诗汇评》、陶澍《靖节先生集》。这些版本比较精良, 文学价值高, 可供阅读研究, 对于后人的学术研究很有现实意义。

与此同时, 清人评价讨论涉及陶渊明诗歌的著作有百余种之多, 不少学者致力于陶渊明诗歌相关资料的汇编和考订, 进一步探讨了陶渊明的家世、生卒年月、作品真伪等问题。在北京大学中文系和北京师大中文系合编的《陶渊明研究资料汇编》中, 清代士人评论陶渊明及其诗歌的评论就达 84 家之多。其中一些评论开拓了陶渊明研究的深度和角度, 具有较高的文学价值, 比如邱嘉穗《东山草堂陶诗笺》、吴瞻泰《陶诗汇注》、马璞《陶诗本

义》、温汝能《陶诗汇评》、陶彭《靖节先生集集注》、钟秀《陶靖节记事诗品》、方宗诚《陶诗真论》等。这些评论家有的厘正文本,有的训诂字义,有的疏通文意,有的搜辑资料等,为还原陶渊明及其作品的本来面目作出了自己的努力。比如恽敬(1757~1871)以考据反驳了南宋吴斗南提出的“陶渊明受恒玄之辟”的说法。他认为:“按昭明太子序曰:‘素爱其文,不能释手,故加搜校,粗为曲目’是先生之诗,并无先后次第也。斗南见《始作镇军参军经曲阿》一章在《庚子自都还阻风规林》、《辛丑赴假江陵夜行涂口》二诗之前,意先生庚子、辛丑起官,可谓固矣。”<sup>[4]</sup>宋人吴斗南依据《靖节先生集》里作品的排列的先后来判断作品创作时间的先后,恽敬指出这种方法得出结论过于武断,他认为在武断的结论基础上所作《年谱》更属不当。宋人的学问是相当扎实的,恽敬通过细心的考证,以大胆怀疑的精神反对《宋书》《南史》的观点,展示了清人治学求实的特点。他同时通过考据认为陶渊明作品所作的地点、时间各有不同,反对任意解读、误读陶诗。

清人秉持严谨的学风来研究陶渊明,使得后人对历史上真实的陶渊明有了更多的认识。

二、前人关于“永初甲子”说一直没有定论,清初文人就前人疑问继续展开论争。这时期的论争由于考据学的兴起而带有考据论证的特色,论争双方都从考据角度来辨析,富有逻辑性与思辨性。

与顾炎武为友的朱鹤龄(1606~1683)在经学上颇有造诣,有经书注疏和儒家理学研究成果《易广议略》,研究汉学、宋学成果《尚书埤传》。他认为:“渊明庚子以后,即提甲子,盖逆知末流之必至于此也。叠山之论固核,然吾观渊明之意,有进于是。彼夫刘裕之猜忌,傅亮、谢晦诸人之卖国,不难于司马天子为几上肉。其肯容晋室遗臣,傲然削新朝之帝号,而悠游以羲皇上人终老耶?况渊明之祖烈之清名,又诸人之所深恶,而思欲媒孽其短者耶!故其诗之止书甲子者,所以存其耻事二姓之心,书甲子而始于二十年以前者,又所以泯其不书年号之迹,……”<sup>[5]</sup>朱鹤龄在评论陶渊明时,延续了前人的“永初甲子”说,但他引用证据来加以论证方法为后人开了风气。他把陶渊明的身世和作品结合起来分析,他指出当时的政治环境是容不下陶渊明的,同时由于祖父陶侃有清名,所以陶渊明不书年号只书甲子是忠君爱国的表现。这种综合分析的方法显得更有说服力。同样处于明末清初时期的傅占衡(1606~1660)却是反对“永初甲子”说的。他仔细分析“永初甲子”说认为:“《文选》陶诗《辛丑岁七月赴假还江陵夜行涂口作》题下注云:‘潜自以曾祖晋世

宰辅,耻居身后代,凡诗在晋时作者,皆题年号,入宋但题甲子而已。’《选》中陶诗有岁月者独此,故以是说注之。以应史文。按辛丑是晋隆五年,与皆题年号之说适相违背,此注与史传皆妄也。”<sup>[6]</sup>傅占衡反对《文选》注和史传的观点,同样运用了考据来加以论证。他通过考证发现《文选》仅仅根据一首诗就附和史传的观点,在进一步考证中他发现:《文选》陶诗《辛丑岁七月赴假还江陵夜行涂口作》中的“辛丑”是晋隆五年,这本身与《文选》的注相矛盾。他认为《文选》注者出于自己的理解,为了和史书相符,没有有力的证据就随便下注。历代陶渊明的研究者或出于自己的本意,或理解错误,造出了大量的异文,即傅占衡提到的“注与史传皆妄”得情况。在历史发展过程中,后人给陶渊明作品做注解和为陶渊明立传中加入了自己的见解,于是陶渊明的真实形象消失了,产生了与真实不尽相同的陶渊明,即想象中的陶渊明。傅占衡的考证力求论证“永初甲子”说是错误的。此后,关于“永初甲子”说的讨论并没有告一段落。之后的清代士人继续运用了考证的方法,以此来证明自己观点正确或抨击别人的观点。比如邱嘉穗(约公元1717年前后在世)就提出:“考古人著作,无于诗每首文每篇俱题年月体,陶公所题,当在卷轴之端,近世久抄轶弗存耳,未必於篇章首逐条大书特书也。十条三篇,大抵信笔偶及,因《文选》误注,遂令人疑沈、李二史之妄。”<sup>[7]</sup>他结合古代诗歌创作背景,提出陶渊明只是在诗文的卷轴末端题年月,不可能在每首诗每篇文章上都题年月。他认为是《文选》注出现差错,导致人们对沈、李二史的真实性产生了怀疑。又比如陶澍认为:“《五柳传》云:‘尝著文章自娱,颇示己志。’则其集必有自定之本可知。约去先生仅十余年,必亲见先生自定之本可知。窃意自定之本,其目以编年为序,而所谓或书年号,或仅书甲子者,乃皆见于目录中,故约作《宋书》,特为发其微趣。……”<sup>[8]</sup>他从作品集流传年代远近来推测,认为宋僧思悦提出的“无年号甲子”说是不对的,而史书和《文选》的观点是正确的。他认为陶渊明因为怜悯感伤晋朝的灭亡,在诗中是有寄托的。

清人运用了考据来考证陶渊明诗歌是否存在“永初甲子”说,尽管考证的方向和角度各不相同,但考据方法的运用显示了陶渊明研究的发展,使人们对陶渊明的认识和理解趋于理性,不再赋予陶渊明及其作品过多的历史价值和意义。

三、清人运用了考据来赏析陶渊明诗歌和论证陶渊明在文坛上的地位。清代士人不仅从诗法上来赏析陶渊明的诗歌,他们还以考据的形式来赏析陶渊明诗歌字

词,这使陶渊明研究显得更有深度。

清人吴靛文没有盲从于大家,他以有力的论证反对苏东坡对陶渊明的评价。他认为:“曹、刘以下六人,岂肯少让渊明哉,欲推尊渊明,而抑诸人为莫及焉,坡公之论过矣。夫亦曰以诸人之诗较之渊明,譬之春兰秋菊不同其芳,菜羹肉脍各有其味,听人之自好耳,如此乃为公论。……此是其好陶之至,不自知其言之病也。杜老诗已独绝千古,而谓其不如渊明,吾尤至死不服。盖杜诗如清庙明堂,极崇弘萧穆之象,陶诗如竹庐茅舍,备萧散冲淡之趣,虽曰彼则有意为工,此则不费力而成,然陶诗如清和任之圣各造其一偏,杜诗则为时中之圣,诸家之妙无一不备。”<sup>[7]</sup>他通过纵向的比较,指出相比于陶渊明,建安诸子并不逊色,杜甫的诗歌艺术特色也是更加丰富的,不能因为个人爱好而不顾实际大加拔高陶渊明。

清人由于运用了考据学的知识,在赏析陶渊明的作品也往往能够做到精细入微。清末的延君寿说:“《五月旦作》起笔云:‘虚舟从逸摧,回复遂无穷。’写舟行之妙,不可思议。‘逸’字下得新。‘回复无穷’,是从上‘纵’字来。‘神渊泻时雨,晨色奏景风’,用‘泻’字‘奏’字妙,能状出‘神’字‘晨’字来。末云:‘即事如已高,何必升华簷。’收得挺健。赞此可悟用字起结之法。又《刘柴桑》云:‘良辰入奇怀,掣杖还西庐。’‘奇怀’字是自家觉得放无奇处领会出来,他人不得而知也。”<sup>[8]</sup>延君寿又说:“《癸卯十二月作》云:‘凄凄岁暮风,豁豁经日雪,倾耳无希声,在目皓已洁。’自是咏雪名句。下接云:‘劲气侵襟袖,革瓢谢屐设。’接得沈著有力量。又云:‘高操非所攀,深得固穷节。平津苟不由,栖迟诘为拙!’想见作者之磊落光明,傲物自高。每闻人称陶公恬淡,固也;然试想此等人物,如松柏之耐岁寒,其劲直之气,与有生俱来,安能不偶然流露放褚墨之间。”<sup>[9]</sup>对陶渊明作品中的字词品鉴前人已有,如苏轼对“望”和“见”的经典评价。但在陶渊明诗歌研究中,类似苏轼的字词评价在清代以前是不多的。正是清人考据学的兴盛,对文字变得敏感,对陶渊明诗歌的字词才会加以着重分析。通过对陶渊明作品中的个别字句的分析,延君寿阐释了陶渊明诗歌的语言美,开拓了陶渊明诗歌的美学内涵。

刘勰在《文心雕龙·知音篇》开头就提到:“音实难知,知实难逢,逢其知音,千载其一乎。”<sup>[10]</sup>读者难以发现文本真正价值的原因正如刘勰所指出的:要么“学不逮文,而信伪迷真”,<sup>[11]</sup>要么“知多偏好,人莫圆该”。<sup>[12]</sup>为此他接着提出文学鉴赏中要做到:“一观位体,二观置辞,三观通变,四观奇正,五观事义,六观宫商。”<sup>[13]</sup>清代

士人的陶渊明研究在考据学影响下显得系统而有条理,能够达到刘勰《文心雕龙·知音篇》中对文学鉴赏的要求,做到“平理若衡,照辞如镜”,<sup>[14]</sup>“披文以入情,沿波讨源,虽幽必显”。<sup>[15]</sup>正是清人的努力,对陶渊明诗歌客观的理解才得以实现,才能真正理解陶渊明诗歌语言所带来的诗性含义、直面作品的本真意义。

总之,在清代考据学的影响下,陶渊明及其诗歌研究显得更为理性和精深,促进清人以新的角度赏析。清代考据学不仅为陶渊明诗歌及相关资料的编订提供了方法,且使对陶渊明作品年代有无的论证趋于实证,同时也为后人提供了好的材料和新的思路。

#### 参考文献:

- [1] 宋庠. 私记[A]. 陶潜. 陶渊明集校笺[M]. 龚斌,校笺.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471.
- [2] 恽敬. 大云山房文稿·二集卷二[A]. 顾廷龙. 续修四库全书·集部第1482册别集类[C].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225.
- [3] 朱鹤龄. 愚庵小集·卷十一[M].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年.
- [4] 傅占衡. 湘帆堂集·卷十一[A]. 四库禁毁书丛刊编纂委员会. 四库禁毁丛刊·集部第165册[C]. 北京:北京出版社,1998:623.
- [5] 丘嘉穗. 东山草堂陶诗笺一则[A]. 北京大学师范大学中文系,北京大学中文系文学史教研室. 陶渊明资料汇编·上册[C]. 北京:中华书局,1962:188.
- [6] 陶澍. 靖节先生集集注·卷三[A]. 顾廷龙. 续修四库全书·集部第1304册别集类[C].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286.
- [7] 吴靛文. 陶渊明集批语一则[A]. 北京大学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北京大学中文系文学史教研室. 陶渊明资料汇编·上册[C]. 北京:中华书局,1962:202-203.
- [8] [9] 延君寿. 老生常谈四则[A]. 北京大学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北京大学中文系文学史教研室. 陶渊明资料汇编·上册[C]. 北京:中华书局,1962:262.
- [10] [11] [12] [13] [14] [15] 心雕龙注释[M]. 刘勰,著. 周振甫,注.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517,517,518,518,518,518.